

第一章 概念、理论、 分析框架

任何研究都是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概念是研究的出发点。理论的运用是研究的工具和指导，适当的理论提供一种观察事物的眼光或对事物的理解。本章的内容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概念上的梳理和界定，分析涉及安全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从中找出适用的理论或者理论的适用部分，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研究安全问题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安全，并以此为起点具体化地展开研究。也就是说要研究谁的安全，即安全的主体是谁，这个安全主体所处的国际社会情况如何，它需要保护的的价值是什么，它用什么手段去维护这些价值。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欧洲安全结构在冷战结束后的建设情况，这里我们首先遇到了三个重要概念的界定问题，即欧洲安全、欧洲的安全主体以及欧洲安全结构。这些在冷战期间较为清晰明确的概念，在进入冷战后的分析视野时，其内涵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安全的概念

从汉语意义上讲，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这样一种状态。根据《韦伯国际词典》，在英语中安全既表示一种没有危险、没有恐惧、免于担忧、没有不确定性的状态，同时还表示进行防卫和保护的各种措施^①。从这个层面上说，安全不仅仅是一种状态，还包括获取安全的手段。将语言学意义上的安全延伸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有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概念。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全问题专家沃尔弗斯被广为引用的说法，“安全”是一种“已经获得的价值没有受到威胁的”状况。另一位美国学者鲍德温又加入了一种量的概念，认为“安全”是“已获得的价值被破坏的可能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②由于安全的主体不同，其所要维护的价值并非总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安全概念历来就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概念，人们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演变不断调整对安全的界定。

应该说，在冷战期间的欧洲，安全概念是相对明确的。一提到欧洲安全，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大都集中在东西方安全困境、美苏战略力量平衡以及核武器系统的发展和影响等问题上。换句话说，这一时期所有的安全问题，基本上都与两极结构有关，安全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具有战略性意义。但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的概念与冷战时期已有很大的不同。“日益明显的变化是，实际上不能再狭隘地定义‘安全’了，处理 1990 年和 90 年代以后的‘欧洲安全’不能仅仅依赖于战略性问题的解决”，^③ 还需要面对许多新的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三个影响安全概念界定的新因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直制约和影响各国安全政策与实践的国际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致使与这种结构因素密切相关的各种安全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而传统的、历史性安全问题如领

土纠纷、民族或种族矛盾、宗教冲突等表面化，导致安全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敌友界线不甚分明，^④由内战导致的安全问题上升；其次，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运行，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领域和环境方面的深刻变化，使得安全的层面和所涵盖的内容大大扩展。一方面，安全主体的层面从传统的国家层面向个体和全球两个方向延伸；另一方面，安全所涵盖的内容广泛涉及了除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再次，技术的加速变革以及信息社会的来临，导致维护安全的手段不断更新，新军事革命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前所未有的。

上述变化导致冷战后欧洲的安全研究出现了三个新的趋势：第一，出现了从个人和世界共同体的角度界定安全的新趋势；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界定安全虽然依旧是各国制定安全战略的出发点，但其重要性遭到了侵蚀；第二，不再仅仅从静态的维护现状的角度看待安全，而是更多地从未来发展和演变趋势的角度考察安全问题；第三，安全不再等同于军事或战略问题，对安全威胁的界定趋向宽泛，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社会文化认同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总之，安全概念日益成为一个在“本质上

有争议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⑤

这样三个趋势表现在安全概念的界定上，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野。一部分学者认为，安全仍然“是一个国家以其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消费、积累和使用其财富的能力”。^⑥这种强调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政策选择机制不受外部控制为重点的安全界定，反映的是传统的安全观。另一部分学者在摆脱了两极体制约束之后，强调适应欧洲变化了的形势，以人的安全、以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为中心研究安全问题。这两种安全观表现出一些共同的新特点：首先，它们都强调，“认同问题是不能从安全中分离出去的。所谓认同问题，即我真正认为我是谁，……他们认为他们是谁，是什么导致我们相信我们是一样的而与他们是不同的”。^⑦他们认为，“安全问题专家应该更多地关注主体实现的含义，而不只关

注客体的追求。”^⑧其次，他们都否认国家是个体安全的基础和来源，甚至认为有时国家本身就是世界政治中安全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问题的主要来源，而不是安全的解决办法。

在欧洲，安全概念的这种争议性，说到底反映的是欧洲主权观念以及建立在主权概念基础上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深刻变化。主权国家由于“其作为一种结构、一种集合体、一个组织、一种政策工具、或是作为所有其他价值从属于它的最高价值的这种多重特点”，其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⑨二战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深刻变化，尤其是两极体系桎梏的解除，使得安全概念上的争议在冷战后时期变得异常突出。

的确，安全总是“表现为‘特殊’的东西，而非‘一般’的东西”^⑩，它是个需要从安全主体的角度加以界定的概念。安全，既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加以界定，也可以从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角度去界定，不同的主体范围和主体感受会导致其关注不同的客体现实，因此安全概念莫衷一是。但是，从本质上说，安全是涉及到安全主体生存以及生存状况的问题，是关系到安全主体利益能否不受外力阻碍而实现的问题，它主要表现为一种状况，同时还表现为一种能力，因而与权力密切相关，并且是在安全关系互动中产生的。

因此，总体上说，安全可以从状况、能力和关系三个方面界定：从状况的角度讲，安全是主体的生命和财产以及其所重视的价值不受威胁的状况，它是一种客观现实，同时也与主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正因为此，安全有时还表现为一种主观的追求而不是客观的现实。^⑪从能力的角度讲，安全表现为一种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和再生产价值的的能力。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自己决定怎样使用、积累和再生产价值；二是这种自主决定不受外力的压迫和控制。之所以还要引入“关系”的概念，是因为安全总是相对而言的，是在比较中、与其他存在互动中产生的概念。用布赞的话说，“安全是个关系现象”，“人们不可能在不理

解国家安全置身其中的安全相互依存的国际格局的情况下理解任何给定的国家安全”。^⑫

应该说，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去界定安全，但是一旦深入到安全主体的层面，安全概念的歧义性就又产生出来，正如前所述，安全还与主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本文将下面就欧洲安全结构建设的主体进行探讨。

二、欧洲的范围及欧洲安全结构的行为体

正如安全的主体因素导致安全概念界定上的分歧一样，本文所考察的欧洲以及欧洲安全结构的行为体本身都是需要讨论的概念。

冷战结束以后，从安全的角度界定欧洲一直存在着争议。当然，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是相对明确的。它一般是指位于欧亚大陆的西北部，从大西洋沿岸到乌拉尔山和高加索山脉一带的广阔地区。冷战期间，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欧洲也是界线明确的，人们一般按照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存在而将欧洲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对西欧各国来说，它的安全是免除苏联、东欧集团的威胁，反之亦然。因而，在安全主体和安全追求的目标上不存在模糊状态。冷战结束后，从安全的角度界定欧洲遇到了麻烦。这种麻烦主要是如何区别是哪一部分欧洲的安全，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安全？还是排斥俄罗斯的跨大西洋欧美的安全？也就是说在以谁作为安全主体的问题上出现了如何界定所指的欧洲范围的问题。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奥尔·韦弗早在1990年就指出，实际上存在着四个欧洲的概念。第一个欧洲，是欧共体（1995年以后指欧盟）范围的欧洲，主要是指西欧以及正在扩展进来的国家；第二个欧洲，是从波兰到葡萄牙的欧洲，即没有超级大国的欧洲；第三个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主要是指戴高乐所指的“祖国的欧洲”和戈尔巴乔夫的“共

同欧洲家园”的欧洲；第四个是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欧洲，也即欧安会涵盖的欧洲。^⑬ 韦弗认为，四个欧洲因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防务潜力、聚合程度、以及与美苏的关系等都不尽相同，因而对欧洲安全所具有的含义也就不同。究竟哪一个欧洲将占据主导地位始终处于发展演变之中，因此欧洲的概念是个难以确定的、充满活力和变化的概念。韦弗的话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直到今天，虽然“四个欧洲”的斗争已经初见分晓，但欧洲终止的边缘究竟在哪里仍然不是很清楚。比较清楚的是，冷战后欧洲发展演变围绕的核心是在西欧或者说是在北大西洋地区，但这一中心向外扩展的终点在哪里还不能确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的概念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明确，从地缘政治意义上欧洲逐渐变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界线不清的地区。

欧洲呈现出一种边缘不清的状况，并不是说欧洲的安全问题就变得难以讨论。欧洲著名安全问题专家巴里·布赞曾使用“安全结”（security complex）概念谈论一个地区的安全。这个概念的启发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安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对于安全研究的重要意义。布赞认为，“在一组国家中，它们的安全观念和对安全的关注是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对它们的国家安全问题不能区分开来加以理性的研究。”^⑭ 布赞关于“安全结”的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这一组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安全互动关系；第二，它们之间对安全的看法和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安全结强调的是相互敌对或共享利益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⑮ 根据布赞的说法，中东地区是一个“安全结”，欧洲地区也是一个安全关系密切的“安全结”，因此本文的讨论更多的从“安全结”的角度出发看待欧洲，有时涉及的国家可能从地理范围上超出了欧洲的范围，甚至涉及到了中亚国家和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国家。

以主权国家作为安全主体进行研究，即对国家安全的研究，历来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但是，欧洲的情况有其特殊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地区尤其是西欧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一体化和组织化的地区。从安全的角度说，欧洲地区出现了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家安全利益与地区整体安全利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地区协调和所谓“安全的不可分性”成为地区安全话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安全问题的多边主义反应成为各个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选择，安全组织是这种多边主义反应的重要工具。二是欧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主权国家的观念，另一方面又逐渐整合了分散的中小国家。西欧各国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发展，使这一地区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安全共同体，^⑩并推动它们日益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外部世界在看待西欧时也往往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力量看待，而不是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待西欧。

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在下一节还会论及，这里提到西欧安全共同体，意在强调欧洲部分地区的聚合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安全上的多边主义反应以及西欧安全共同体的形成，使我们感到安全组织研究在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的讨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欧洲地区，结构的单元很难再单纯以西欧单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主权国家对结构建设的参与是一部分，组织的参与较之单个国家的参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安全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并非是中性的，组织利益是组织成员利益的总和，而且往往反映的是主导国家的利益。例如，北约这一安全组织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的利益，欧盟的安全利益是欧盟成员国的利益总和，同时也更多的体现欧盟内大国的利益。如果说美国、俄罗斯更多地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对欧洲冷战后的秩序建设产生重要影响，那么，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要想对秩序建设施加影响，则必须借重组织的力量，即以欧盟整体力量参与。即使是美国，也需借助北约在欧洲安全结构建设中发挥影响。因此，各种安全组织是本书探讨欧洲安全结构建设的重要分析单位，本书就是从欧

洲各主要安全组织入手对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结构进行分析的。

这里讨论欧洲安全结构的行为体或单元问题，意在强调对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的分析不以构成这些组织成员的主权国家为重点。这里并不是否认主权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安全秩序建设中，俄罗斯就是一个重要的以主权国家面貌出现的安全行为体。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各成员国存在着安全共识，也存在着安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因此，本书在考察欧洲安全秩序建设的问题时，一方面对结构建构的单元从欧洲地区的特定情况出发，突出欧洲地区高度一体化和组织化的特点，以组织整体作为分析单元。同时，也考虑主权国家在结构建设中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对主权国家在各安全组织中利益的探讨突出主权国家的因素。

三、安全秩序与安全结构的概念

一般说来，结构是秩序的框架。形象地说，秩序的血肉之躯需要结构的骨骼支撑。研究结构，本质上是探讨秩序问题，因为结构和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秩序，往往与无序相对，意为稳定有序。按照《韦伯国际词典》，秩序总是和等级、顺序、类别、水平联系在一起，是“事物按位置、事件按时间顺序的一种安排”。^①梁守德先生关于“国际秩序”的界定对于我们界定“安全秩序”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既相互联系又不一致的国家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它表现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和顺序，具有相对稳定性。国际秩序是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实力和对外政策相互作用的统一。”^②梁守德先生对秩序的界定起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与赫德利·布尔对“秩序”的界定意思接近，即认为秩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安排，是“一种实际的或可能的局面或事物的状态”^③；第二层含义则强调，这种安排或这种局面的

出现是依据一定的目标或规范进行的，目标、规则是国际秩序建立的基础。日本学者最上敏树指出，“无论是何种政治系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都包含着对‘确立和维持秩序’的期待。‘秩序’……可以定义为，‘由于确立适用于一定人类集团之规则，且其成员自发或被强制地遵守这些规则，其结果提高了集团内部行动预测可能性的状态’”。他指出，在国际关系领域，秩序“基本上限于‘国家之间’的秩序”；秩序的建设，“并不一定与‘正义’观念（即在人或国家之间的本质性平等这一意义上）相一致”；“国际秩序的摸索过程与国家追求权力的过程相并行”。^②这个概念虽然没有回答秩序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但强调了秩序内规则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强调了国际秩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结构相对于秩序是个比较小的概念，即一般地说秩序内包含着某种结构框架，结构是秩序的支撑或基础。国际政治领域的结构，从物质层面上说，主要是指力量以及力量互动形成的一种力量关系，它们构成一种力量对比的状况。即结构。

一般说来，安全秩序是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际秩序的子系统。在地区范围内，则是地区秩序的子系统。由于安全秩序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因而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基石。安全秩序往往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交错和关联的安全关系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在秩序安排上，一定的安全目标和规则，指导和规范着安全关系的变化和各行为体的安全行为。在这里，安全秩序也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利益、实力和对外政策相互作用的统一。“国际秩序的建立，一般由大国和国家集团安排，或以战争为手段，或以强权和法律准则为基础，追求相对稳定的共同目标和协调相互间利益均衡。”^③安全秩序的建立同样也是由大国或国家集团安排，它建立在力量对比所形成的结构基础上，反映的是大国或国家集团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因而在行为规范和指导原则上也反映的是主导力量的价

价值观。冷战期间，欧洲的安全秩序的基础是两极对峙和两个霸权国领导的对立安全联盟基础上的秩序，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导致双方在安全目标和安全规则上的相互矛盾和难以协调。在这个秩序中，两种力量的安全关系相互对抗，安全困境所导致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危机接连发生，因而是一个极为不安全和极易导致战争的秩序。但是实际上，由于美苏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相互威慑形成了一种可信的相互制约结构，长期困扰欧洲的“德国问题”和中东欧小国的力量因两大集团的对峙而得以重新整合，这一时期的安全秩序反而相对稳定。^②冷战以后，欧洲安全秩序的建设依然涉及利益、实力和外交政策目标和手段相互作用的统一，所不同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欧洲各安全组织之间进行的，表现为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和调整改造，组织之间的争夺和斗争。尽管冷战是以和平方式结束的，但冷战后的秩序建设，仍然反映的是胜利一方的主导力量和主导观念。总体上说，美欧主导了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和安全秩序的建设，它们对安全、安全威胁的界定反映的是欧美安全主体的利益和观念，与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

本书重点探讨的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及其结构特征，由于本书主要以安全组织作为结构的单元，因而将分别对欧洲三个重要的安全组织进行系统考察。对于组织目标和任务的考察关系到组织的适应性问题，而组织的适应性体现为一种力量，是结构研究的重点所在。组织目标的确定又与主导国家的战略目标密切联系，目标和规范的探讨作为秩序考察的重点必然同结构研究关联，因此本书的结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欧洲安全秩序的研究，二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节 国际安全理论及对 本研究的适用性

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为研究者提供一种研究的角度，并帮助研究者认清事物的本质。涉及安全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总体上说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

一、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观

（一）国家自助体系与安全困境

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观主要是建立在如下逻辑起点上的：第一，“国际系统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②；第二，国际系统中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主权国家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第三，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竞争关系，国家为了保障生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不可能将其安全建立在别国善意的基础上。因此，国家作为自助的行为体，始终是以追求安全作为首要目标的，而权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

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都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时刻担忧，决定了国家对力量关系变化和相对收益的敏感，这种敏感又决定了国家对安全领域的合作持审慎的态度。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合作是有限的，主要是因为它受到安全竞争这一主导逻辑的制约。”^③安全上的竞争关系导致合作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国家往往担心，对可能获得利益的划分，可能对别的国家而不是对自己更有利。”“只要双方还是担心对方会把增大了的能力用于不利于自己的活动，那么，即使有动人的前景，双方都可以大捞一把，它们还是不会

合作的。”^⑥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对相对收益的敏感，是阻碍安全领域合作的首要障碍。

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不仅对相对收益敏感，而且对相互依赖有着本能的畏惧。沃尔兹认为，“相互依赖着的国家必定会发生冲突，并将不时地陷入暴力中。因为它们的关系没有任何控制，如果相互依存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心控制的速度，那么，相互依存便会加快战争的到来。”^⑦这里，沃尔兹主要是指相互依赖会损害国家的主权，甚至国家的生存。国家为了逃避因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脆弱性，有时会采取暴力的行为，进而导致冲突。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脆弱性，还与国家害怕遭受欺骗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一国的安全与否往往是建立在对别国意图的把握上，由于对别国“意图的推测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确定”再加上意图是经常变化的，“一个国家的意图今天可能是善意的，明天就可能是恶意的。”^⑧因此，在对国家意图的揣测上，不管多么谨小慎微，不确定性是绝对的。这样一来，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脆弱性往往高于经济等其他领域，“不安全的状态，仅双方无法肯定对方将来的意图和行动这一点，就阻碍了双方的合作。”^⑨也就是说，对欺骗行为的担心是影响安全领域合作的又一障碍。

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主权国家的自助行为，必然导致安全上的自保政策。主权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只有通过加强自身国防建设，特别是加强军备这一途径来实现。但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中，这种做法往往会被它国视为威胁，并导致效仿行为，因为，“当一国寻求以各种方式增进自身安全时，会意想不到地产生使他国安全受损的后果”。^⑩而其他国家的效法行为，又会进一步增加这个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即“如果它不采取行动会感到不安全，但是如果采取了行动，它仍然不安全。”^⑪因此，主权国家所采取的安全自保政策，有时可能给国家带来安全，有时则可能导致军备竞赛甚至战争，从而又是

最大的不安全。

“安全困境”表明，任何国家在安全问题上都不可能面临随心所欲的选择，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行为和安全政策，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全追求必然是在安全关系的互动中进行的。因而，政治家在考虑自身安全的同时，总是力图通过建立某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力量结构来保障安全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现实主义看来，与实现各国安全紧密相关的国际秩序有两种：一是势力均衡；一是霸权稳定。

（二）国家安全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1. 势力均衡

势力均衡作为一种安全秩序，被现实主义视为国际政治中必然的和惟一的结果，对于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摩根索所说，“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个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③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均势体系，基于两点重要的假设：“第一，假定所要平衡的各要素对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或者都是有权存在的；第二，若这些要素之间不存在均衡状态，一个要素就会凌驾于其他要素之上，侵犯它们的利益及权利最终并可能破坏它们。”^④由此可见，均衡体制是“以维护各国的独立，反对由一个强权统治世界，力求避免大规模战争这一最小限度的理想为目标的”。^⑤均势体系与安全的关系，是一种在高度竞争、甚至对抗关系中维持主权独立，从而达到体制内主权国家相对安全的一种秩序。

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均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两个孤立国家之间的均势，而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同另一个联盟之间的关系。“势力均衡的逻辑经常导致国家间针对共同敌人的结盟与合作。”^⑥联盟导致的合作是现实主义颇为肯定的一种

理性的合作。在现实主义眼里，均势体系中的合作并未改变国际关系冲突的本质，因为联盟的合作是各国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相互利用，是与针对第三方联系在一起，它反映的是权力的分布和权力的竞争关系，是势力均衡的需要。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安全合作也就不复存在了。合作中形成的制度或机制，也是国家以力量分布现状为基础根据自身利益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因而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上演权力关系的场所”，^⑤“在解释战争问题上，势力均衡是独立变量，制度不过是进程中的一个介入变量而已”。^⑥

2. 霸权稳定

霸权体制在现实主义看来也能带来稳定并进而给主权国家带来相对的安全。但霸权的稳定与均势的稳定不同，均势的目的除了保持体系的稳定之外，还力求保存体系内的主权国家的独立和完整；而霸权的稳定，则允许霸权国破坏和侵犯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权利，凌驾于别国之上。用摩根索的话说，“如果目标只是稳定性，让一个要素破坏和压倒其他要素并取而代之，就可以实现这种稳定性。由于目标是稳定性加上保存体系内所有的要素，这个均衡的目标就必须防止任何要素凌驾其他要素之上。”^⑦由此可见，霸权的稳定，是体系内由具有超出其他诸国力量的霸权国，利用其明显的权力优势，影响和干预国际事务和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以自己为核心的一种国际秩序。由于霸权国地位的维持与整个国际系统的稳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国际系统的稳定往往符合霸权国的根本利益。为此，霸权国愿意向国际社会提供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等国际系统均衡所必需的公共产品，霸权的实力也为国际安全和秩序的稳定提供必要的保障。与此同时，“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他们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并使这些国家愿意接受霸权的领导。^⑧现实主义认为，霸权体系下的安全合作，主要是由于处于国际权力和威望结构顶端的霸权国权

超常，其利用权力优势的意愿强烈，系统内其他成员即使结盟也无力抵消霸权国的力量，因而愿意与霸权国维持合作关系，接受霸权国的领导。同时，对霸权国来说，维持这种合作关系是降低霸权统治成本的需要。在这里，霸权系统中的安全合作，仍然是权力关系的反映，是完全可以从小权力政治的角度加以解释的。

总之，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核心特点是权力的争夺和力量的显示，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夺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这种斗争“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变化，”它反映的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③现实主义相信，“通过对权力和民族利益的仔细分析，政治家可以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秩序，从而缓和自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及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④这种秩序即势力均衡与霸权稳定。

（三）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借鉴与分析

不可否认，在安全研究领域，现实主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说，国家安全是现实主义范式的核心。国际关系研究者只要承认安全始终是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承认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仍然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承认国际系统的特征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获益的前景还没有消除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那么，现实主义理论在安全研究上就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仍然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最完善的出发点”。^⑤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安全问题专家罗伯特·杰维斯所说，“对安全的渴望是解释为什么国际政治存在的部分基石”。^⑥

现实主义理论对欧洲安全秩序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际系统结构取决于各国的相互权力地位；第二，权力结构影响国家利益的判断，进而影响国家的行为；第三，“安全困境”的缓解需要对力量加以控制，并相应地需要一种秩序上的安排。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的建设反映的仍然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实力在安全问题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

最后决定权。

但是，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纯粹的现实主义只能提供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它使任何形式的国际社会都不可能”。^④具体到分析冷战后欧洲安全问题时，现实主义明显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首先，现实主义把国际关系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冲突本质，忽视了国际关系进程因素的影响。所谓国际进程，依据约瑟夫·奈的定义，是指“国际系统中系统单位的互动方式”。^④在欧洲，经过一体化的长期发展，欧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协调磋商的传统，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存在的问题以武装冲突的形式加以解决已经变成了一种难以想象的事情。用现实主义的理论解释欧盟的发展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关系，特别是其国际关系一成不变冲突本质的说法，很难清楚解释欧洲的发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使是扩大到美欧大西洋安全关系，西方联盟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反而经过了调整和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客观发展也是现实主义理论家没有预料到的。

其次，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关于权力的概念始终同对有形资源的占有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军事能力作为权力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具有高度的可转换性。苏珊·斯特兰奇首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权力的先河，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两个重要概念^⑤这是冷战时期现实主义关于权力概念的重要发展。冷战结束以后，权力观念在三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权力资源、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可转换性大大降低。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仍然是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均居首位的霸权国和惟一超级大国，但是由于军事力量可转换性的削弱，在具体问题领域里，美国的力量往往不能达到自己的期望和承诺”。^⑥其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软权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所谓“软权力”是指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向导、建立环境”“使具体某国产生变革”、“使人随我欲”的力量，这是一种“可称为间接的或

者同化式的实力表现”。“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④这一点在冷战后欧洲的安全秩序建设中表现的十分突出。西方国家在北约和欧盟东扩过程中，充分运用价值观念和规范的作用，运用合作机制等制度化手段，介入中东欧国家的国内事物，规范这些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方向，将它们纳入到西方国家主导的安全结构中，在这里“软权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认清现实主义关于权力观念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把握权力结构的复杂性。

另外，现实主义关于势力均衡及霸权稳定这两种安全秩序模式，也难以适用于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的研究。一方面，冷战后欧洲不存在实现力量均衡的条件；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也不能对冷战后的许多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美国在冷战后虽成了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力量的分散导致美国霸权地位在欧洲的相对衰弱，这不仅表现在欧盟一体化在 90 年代末期迅速走向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以及欧盟经济社会因素对欧洲安全所起到的重要稳定作用上，也表现在美国在冷战后的欧洲难以独霸天下，必须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卷入欧洲地区安全事务中。

二、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一种理论范式，虽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并不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自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学者^⑤始拒绝“权力政治”的角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集体安全”以及如何将旧的国际秩序转变成为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新世界秩序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对欧洲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和作用，又成了学者们关注